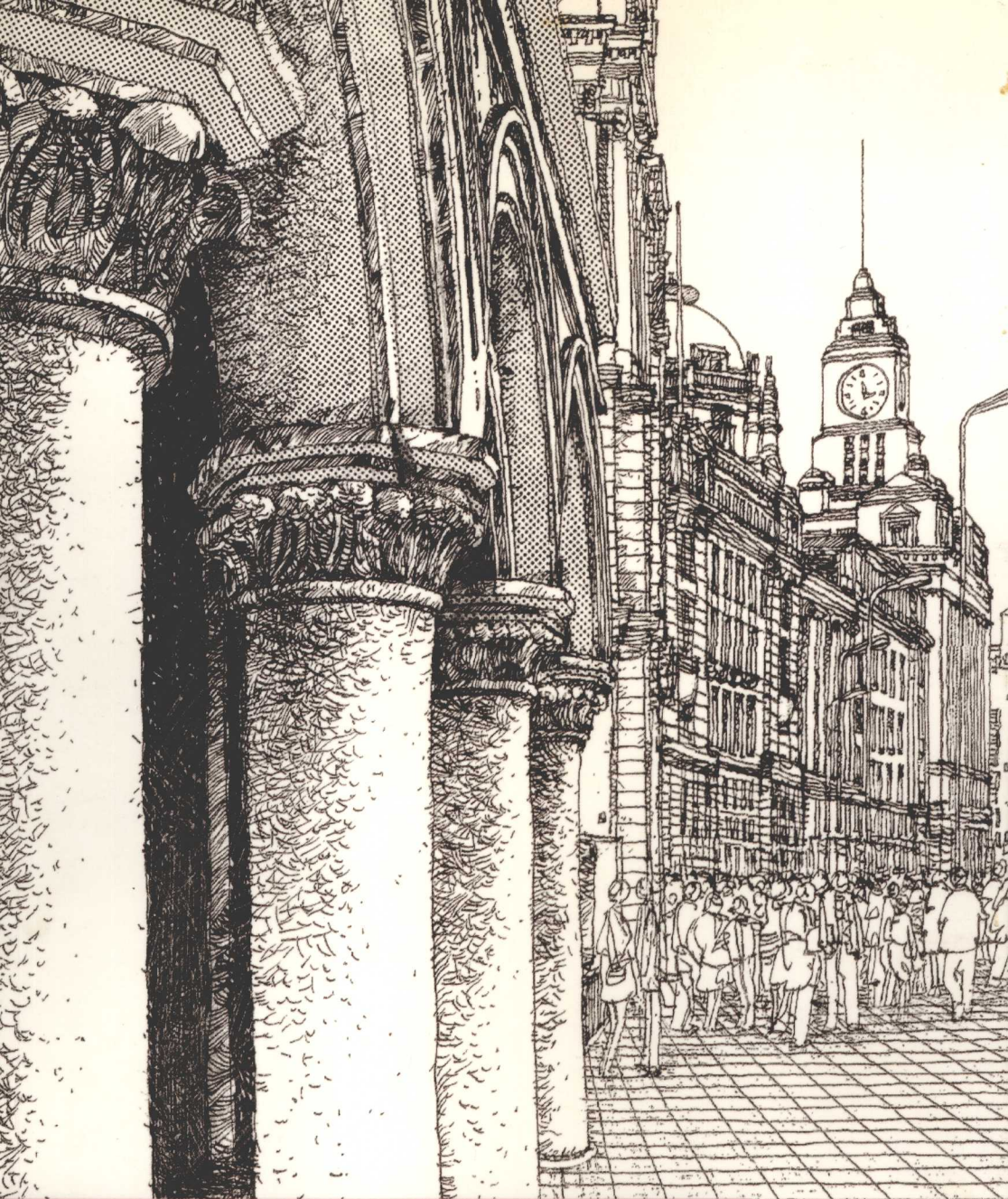




中國知識份子的浮沉

魏承思

中國知識份子的浮沉

魏承思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s a department of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
It furthers the University's objective of excellence in research, scholarship,
and education by publishing worldwide in

Oxford New York

Athens Auckland Bangkok Bogotá Buenos Aires Calcutta
Cape Town Chennai Dar es Salaam Delhi Florence Hong Kong Istanbul
Karachi Kuala Lumpur Madrid Melbourne Mexico City Mumbai
Nairobi Paris São Paulo Taipei Tokyo Toronto Warsaw

Oxford is a registered trade mark of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First published 2004

This impression (lowest digit)

1 3 5 7 9 10 8 6 4 2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in a retrieval system,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without the prior permission in writing of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r as expressly permitted by Law, or under terms agreed with the appropriate
reprographics rights organization. Enquiries concerning reproduction
outside the scope of the above should be sent to the Rights Departmen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t the address below

You must not circulate this book in any other binding or cover
and you must impose the same condition on any acquirer

中國知識份子的浮沉

魏承思

ISBN 0-19-597251-1

版權所有，本書任何部分若未經版權持
有人允許，不得用任何方式抄襲或翻印

Printed in Hong Kong
Published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ina) Ltd
18th Floor, Warwick House East, Taikoo Place, 979 King's Road, Quarry Bay
Hong Kong

T6003

中國知識份子的浮沉

目 錄

1 緒 論

第一節 文獻評述	2
第二節 理論與概念	8
1. 「知識份子」的定義	8
2. 知識份子與社會環境的理論	14
3. 共產黨中國的政治性格	18
第三節 研究方法	22

2 1949年前的上海知識份子

第一節 上海的歷史變遷	25
第二節 1949年前的上海社會與文化	29
1. 民間社會與公共領域的出現	30
2. 創新、開放、多元、崇實的文化	38
第三節 1949年前的上海知識份子	41
1. 中國現代最大的知識份子群體	42
2. 上海知識份子的自由主義傳統	46

3 全能主義政治的形成：1949－1957

第一節 1949－1957年上海知識份子生存環境	53
第二節 工具化：中共的知識份子政策傳統	77
第三節 從「思想改造」到反胡風	87
1. 肅清親美，崇美思想	87
2. 思想改造運動	90

3. 批判俞平伯，胡適，梁漱溟	99
4. 胡風事件	103
4 知識份子抗拒工具化	
第一節 反右運動：公開的衝突	111
第二節 《文匯報》的文人辦報傳統	121
第三節 《文匯報》和上海新聞界的右派份子	130
5 全能主義政治的確立：1958 — 1976	
第一節 1958 — 1966 年上海知識份子生存環境	149
第二節 嚴密的思想文化控制	163
第三節 1966 — 1976 年的「文化大革命」	170
6 知識份子全面工具化	
第一節 反右後的知識份子群體	175
1. 獨立知識份子的沉寂	176
2. 改造成成功的知識份子	179
3. 新型知識份子	185
4. 1960 年代的文化官僚	187
第二節 典型的工具：上海市委寫作組	190
第三節 寫作組裏的知識份子	201
7 知識份子的另類反抗	
第一節 為維護獨立人格而抗爭的知識份子	217
第二節 文革中的獨立知識份子精神先驅	223
第三節 文革中的知識份子異端思潮	227
第四節 「四·五」天安門事件	235

第五節 1960 — 70 年代的地下讀書運動	238
8 知識份子的去工具化：1976 — 1989	
第一節 全能主義政治的削弱	247
第二節 解凍時期	254
第三節 自由化與反自由化	263
第四節 1989 年的民主運動	271
9 知識份子與改革開放	
第一節 改革風口浪尖上的《世界經濟導報》	277
第二節 八九民運與《導報》	289
第三節 《導報》的知識份子	296
10 結論：知識份子與社會環境	
第一節 知識份子與民間社會、公眾領域	316
第二節 三種不同的知識份子	320
1. 獨立知識份子與 1957 年前的中國	320
2. 工具知識份子與 1957 — 1976 年的中國	322
3. 改革知識份子與 1980 年代的中國	326
第三節 傳統的嬗變：適應與內化	328
後 記	334
參考文獻	336
附 錄	345

• 1 •

緒 論

知識份子在中國社會中是一個特殊群體。她對中國各歷史時期的文化、政治、經濟、社會變遷都產生了重大影響，特別是直接影響了中國現代化的進程。與其他國家的知識份子相比，中國的知識份子群體又有其獨特性。因此，近年來中國知識份子問題已成為海內外學術界關注的重點。

在1949年後的中國，執政的共產黨逐步建立起一個全能主義政治的社會，不僅政黨與國家合一，而且國家與社會等同。在這樣一個環境中，知識份子與國家的關係、知識份子的社會地位與社會角色，知識份子的思想，政治態度和行為都發生了一系列變化。共產黨中國的知識份子既不同於其他國家的知識份子，也有別於中國社會傳統的知識份子。在當今世界各地的知識份子中，共產黨中國的知識份子可以說是一種特殊的類型。在既成的理論範典中很難找到一種能完全適用於理解共產黨中國的知識份子。

本書主要考察了1949到1989年間上海三個知識份子群體成員思想、政治態度和行為的變化。透過這些考察以了解在中共實行全能主義政治過程中，知識份子有些甚麼變化，以及導致這些變化的原因。許多知識份子在向國民黨政府爭民主時無所畏懼，為什麼在共產黨統治下會變得膽小怕事？許多名聞中外的知識份子為什麼會對一個微不足道的共產黨基層官員俯首貼耳？甚麼力量促使知識份子從公眾意見的代言人變為政治權力的馴服工具？是政治高壓，是文化傳統，是意

識形態，還是社會環境？對此，中國和西方學者都曾經給予不同的解答。本書試圖運用關於個人與社會環境關係的社會學理論來分析這個問題，揭示社會環境對知識份子思想、政治態度和行為的制約作用，建立起一個理解共產黨中國知識份子的理論框架。

本書的研究對象集中在1949年到1989年的上海知識份子群體。上海是中國最大的現代城市，也是中國現代知識份子的集中地。在中國現代歷史的各個階段，上海的知識份子都扮演了重要的社會角色。另一方面，上海也是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地。中共從一開始就與上海的知識份子發生關係。1949年以後，許多涉及中共與知識份子關係的重大事件都牽涉到上海。因此，上海知識份子群體在整個中國具有典型意義。

第一節 文獻評述

對於中國知識份子問題，中外許多學者分別在社會學、歷史學或政治學等領域進行了研究，也取得了一些可觀的成果。然而，對共產黨中國知識份子的研究就相對比較薄弱。雖然，近年來這方面的研究已開始受到學術界的重視，無論是在史實的分析，還是在理論的探索上，都有明顯的進展，但仍缺乏系統的理论分析。本書將在對以往研究成果的總結基礎上，力求有新的突破。

研究共產黨中國的知識份子，必然涉及共產黨的知識份子政策和對知識份子的總體評價。格德曼(Goldman, Merle)的研究在西方學術圈中是最有影響的。關於知識份子政策，她提出：1949年以後，共產黨政權既尋求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意識形態教化知識份子，又試圖發揮他們的專長去發展一個工業化、現代化的社會。為此，中共一方面要求知識份子嚴守正統，另一方面又鼓勵他們創造地工作。這種矛盾導致中共的知識份子政策始終在壓力和寬鬆之間擺動。中共先是對知識份子施壓，然後又在不同程度上放鬆壓力。這些政策變化的原

因主要是國內的經濟和政治因素，有時也受到國際事件的影響。例如，在經濟危機時期，中共會放鬆對知識份子的壓力，爭取他們的合作以便解決面臨的問題。¹格德曼把1953年、1956—1957年和1961—1962年稱為寬鬆時期。這一「政策循環說」至今仍主導西方學術界對中共知識份子政策的研究。

其實，雖然共產黨政權對知識份子確實表現出時而嚴厲、時而寬鬆的不同態度，但這只是表面現象。一張一弛，始終是中國傳統的統治技術。在研究中共知識份子政策時更應該看到變化中的不變，尋找中共知識份子政策一以貫之的傳統。如果不是僅僅以政治運動為考察對象，把視野擴展到日常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生活範圍，就不難發現：從1949年到1978年期間，中共對知識份子的控制不但沒有放鬆，反而是越來越緊。並且，從中共形成明確的知識份子政策後，以工具化為目的的傳統始終未曾改變過。

關於對知識份子的總體評價，格德曼認為：在共產黨中國，專制統治的壓迫並沒有導致獨立知識份子的消失，他們的傳統也一直沒有終止。儘管經歷了文化大革命，他們與當局的鬥爭始終堅持着。(1971：278)她把共產黨中國的知識份子分為自由主義和激進主義兩個陣營。那麼，在1957年胡風份子和右派份子都被整肅後，哪些人代表自由主義知識份子呢？格德曼為了論證自己的這個觀點，就將北京市委官員鄧拓、吳晗、廖沫沙和中央宣傳部的文化官員田漢、夏衍、邵荃麟，甚至長期擔任中共意識形態最高發言人的周揚統統歸入自由知識份子群體。(1987：18-60)在1957年後，雖然共產黨體制內確有不同的聲音，但並不存在獨立的知識份子群體。無論是鄧拓，還是田漢、周揚等人也從來沒有反對過共產黨的意識形態和政治理念。他們即使

1 Lewis, John, 1970: 268-273; 1971: 1-2; 費正清, 1990: 231。

曾對最高領導人有過批評，也並沒有超出古代士大夫「進諫」的水平。顯然用現成的西方理論模式去研究共產黨中國的知識份子問題是相當困難的。

中國學者在涉及對共產黨中國知識份子的總體評價時，看法往往都比較一致。大多數人都認為在 1957 年反右運動後，一直到 1976 年「文化大革命」結束為止，中國知識份子已經喪失了獨立性、自主性和批判性。然而，對箇中原因也是眾說紛紜。舉其大要，可分四種說法：

第一，共產黨的政治高壓導致知識份子不敢講話。持這種說法的主要是 1960—70 年代的港台學術界。例如，玄默在《中共對知識份子的統戰和迫害》中稱：中共「一波一波地開展思想和政治路線鬥爭，使知識份子永無寧日，心裏總有一個恐怖陰影，警惕着自己經常要謹言慎行，謹小慎微。」(1979：12)² 中共在歷次政治運動中對知識份子的迫害，固然給他們帶來巨大的壓力。然而，許多自由知識份子，例如王造時等人，在 1949 年前也遭受過國民黨政府的政治迫害，或坐過監獄，或受到特務暗殺的恐怖威脅。當時他們並沒有屈服於政治高壓，為什麼在共產黨的高壓下就會變成另一個人了呢？可見這種解釋的說服力顯然不夠充分。

第二，共產黨的意識形態灌輸導致知識份子放棄了獨立性。這種意識形態灌輸即共產黨所稱的「思想改造」，西方學者稱其為「洗腦」。雖然許多中國學者都持這種觀點，但在這方面最有影響的研究則是英國學者利夫頓(Lifton, Robert)的《思想改造與極權主義心理學：對中國「洗腦」的研究》。他訪談了 40 名親歷過 1950 年代初思想改造的知識份子，其中包括 25 名西方人和 15 名中國人，從而取得第一手的資料。利夫頓根據這些資料進行心理學分析，揭示中共思想改造

2 唐勃的《中共和知識份子》和陳克煒的《大陸知識份子的悲劇》等著作都有類似的看法。

的心理技術以及對人的心理變化過程所起的作用。他指出，「思想改造由兩個基本因素組成：一是坦白，即揭露和承認過去和現時的罪惡；二是再教育，即一個人按照共產主義模型重新塑造。兩者是緊密聯繫和重疊的，都導致理念、情感和心理上的壓力和訴求，目標都是為了社會控制和個人轉變。」(1967：5)他認為，這種思想改造的結果是把中國知識份子從一個「孝子」轉變為一個「孝順的共產主義者」，即所謂「社會主義新人」。³雖然意識形態灌輸對知識份子思想、情感和心理的改變有一定的作用，但這一作用不宜誇大。下面的研究將證明：1950年代初的思想改造運動並沒有使知識份子群體從內心真正認同自身作為政治工具的價值。⁴

第三，中國知識份子沒有獨立性和批判性是文化傳統使然。例如，劉曉波把中國知識份子對強權統治缺乏鬥爭性的原因歸之於其政治性人格：「中國是一個知識政治化和知識份子官僚化的國家。如果把知識性人格作為衡量知識份子的標準，中國到現在也沒有形成一個獨立的知識份子群體。在中國，知識份子從來沒有取得過獨立於政治權力的社會地位。中國知識份子一直是專制政治的組成部份，他們不僅在理論上為專制政體提供思想工具，更在人格上為官僚集團準備豐富的人力資源。」⁵金觀濤則提出：「立場決定論，足以摧毀老知識份

3 同樣的研究還有 Mu, Fu-sheng 的 *The Wilting of the Hundred Flowers: The Chinese Intelligentsia Under Mao* 和 Chen, Theodore His-en, *Thought Reform of the Chinese Intellectuals*。

4 參見本文第三章第三節。

5 劉曉波的「政治性人格」是相對於知識性人格而言的。按照他的說法，兩者的主要區別在於：

一、在社會地位上，政治性人格的知識份子必須依靠於某種社會的政治力量，因而沒有獨立的社會地位；而知識性人格的知識份子則不依靠任何其他的社會力量，只憑藉他們所擁有的知識便能取得獨立的社會地位。

二、在倫理的或人生價值取向上，政治性人格的知識份子把通過知識來獲取政治權力視為人生的首要目標，學術研究、藝術創作不是目的，而是從政的手段。而知識性人格的知識份子則把創造知識、傳播知識視為首要的、自足的人生目標。

子的道德勇氣，使最富有批判精神的人失去抵禦自衛的能力。」他認為，這個「立場決定論」是共產主義社會理想與儒家倫理結構的結合。⁶雖然，金觀濤沒有像劉曉波那樣把共產黨中國知識份子的特點直接與幾千年的傳統聯繫起來，但基本上還是從文化傳統的角度去詮釋知識份子現狀的。知識份子的現實表現固然與文化傳統有關，但撇開傳統賴以存在的社會經濟基礎來分析問題，傳統似乎變成了一種與生俱來的遺傳因子，以致這類理論分析顯得蒼白無力。

第四，社會結構的變動導致知識份子在共產黨統治下的變化。例如，余英時以「邊緣化」來概括中國知識份子社會地位的變化。他認

為知識而知識、追求知識是他們的生活的目的，而不是手段。

三、政治性人格的知識份子所學的知識大都與政治密切相關，他們攝取知識的角度、方法和範圍受到先在的政治目的的制約，不可能獲得獨立於政治的知識。而知識性人格的知識份子，更注重不同於政治的純粹知識，他們是從純學術、純藝術的角度去進行學術研究，其方法和標準都不受政治的影響，而是有獨立的方法和檢驗標準。

四、政治性人格的知識份子與社會政治的關係是生死與共的關係，因而他們無法站在獨立的立場上對社會政治保持一種理性的批判態度，而只能採取功利性的辯論態度。他們非但不具有獨立於政治的地位，反而是社會政治的有機構成部份。而知識性人格的知識份子與社會政治的關係是分離的，他們始終站在獨立的知識立場對社會政治保持一種理性的批判態度，是超然的批判主義者或自由主義者。

五、政治性人格的知識份子無法構成一種限制政治權力惡性膨脹的獨立社會力量，而是縱惠權力的不受制約和為所欲為；而知識性人格的知識份子則構成一種獨立的，強大的限制政治權力的社會力量，使掌權者無法為所欲為。（1980：2-5）

- 6 金觀濤稱：「在中國當代文化結構中，由於社會觀是共產主義，而且它是以階級鬥爭為手段，把實現共產主義的理想為終極關懷，於是必然帶來一個價值系統和社會觀相適應的問題。本世紀三十年代，中國共產黨人在這方面做了驚人的創造，居然把儒家倫理結構和共產主義社會理想，聯結為一個整體。一方面，他們把以知識真理為中心的馬克思主義學說，變為以學習馬克思、列寧立場感情為中心的道德理想主義體系，而且又創造性地運用了馬克思主義中，存在和意識之間的互動關係，引進人在改造社會的同時，必須改造自己的思想的原理，從而把儒家倫理和做聖人的道德理想，和共產主義道德與實現共產主義理想結合起來。這樣，一種新的價值結構出現了。它的一頭是潛含着現代化目標的共產主義理想，另一頭，是可以利用傳統力量去整合社會的儒家倫理與泛道德主義。這個結構中，由於立場是價值觀和社會觀的結合點，所以它必然是整個理論體系中具體價值的來源。」（1989：109-116）

為：進入20世紀，政治制度的崩潰造成「知識份子從中心向邊緣的移動」。「1949年才正式標誌着現代中國知識份子走到了邊緣化的盡頭。」因為「1949年以後，共產黨成為中國唯一的、無孔不入的、無遠弗屆的、包攬一切的政治組織，因此絕對地控制了中國人的一切生活資料和精神資源及其運用的方式。」知識份子就不得不依附在共產黨這張「皮」上。(1991：16-25)余英時用「邊緣化」來概括中國知識份子社會地位的逐漸下降和社會作用的逐漸削弱，頗有啟發性。然而，對1949年前後中國知識份子的生存環境和社會角色不加區別，把1949年以後的知識份子狀況說成是近代以來邊緣化過程的延續，就有點過於簡單。

黃平用「非知識份子化」來概括共產黨中國知識份子的狀況。他指出：由於制度規範和話語轉換的雙重作用，中國知識份子在毛澤東時代經歷了一個非知識份子化過程。「1949年以後，新體制將各種類型的知識份子納入了先後建立起來的以單位為核心、以戶口為紐帶的制度性網絡之中。並且，與這種制度性約束相配合，各種類型的知識份子都相繼經受了以思想改造和意識形態批判為標誌的話語轉換過程。正是由於制度與話語的雙重作用，使得中國知識份子不但在行動範圍中，而且也在思想天地裏受制於體制，使他們在很大程度上非知識份子化了。

除了在具體工作上仍然主要以科學、教育、文化、藝術、新聞、出版為主要內容外，無論是在職業的確定以及居住地的選擇上，還是在學術趨向、學派歸宿乃至思想方式和語言表述上，中國知識份子都不再是原來意義上的自由職業者，或者不再是曼海姆(Mannheim, Karl)所描述的『相對自由漂游』的人。』(1994：37-50)黃平觀察到社會制度對中國知識份子的影響。這是很見地的分析。但他所說的「非知識份子化」難免涉及「知識份子」的定義問題，容易引起爭議，因此很

難被普遍接受為詮釋共產黨中國知識份子的理論概念。

金耀基從知識份子在共產黨中國所處的結構性條件去說明他們的思想、態度和行為。他指出：「在黨國的霸權統治之下，知識份子被整合進了黨國的官僚體系中。的確，中國的知識份子，不管是作家、科學家、教授、記者，還是其他類型的腦力勞動者，都以這種或那種方式成為國家僱員。可以說，在現代中國，如果你不是某類體制化的知識份子，那你就根本算不上是一個合法的知識份子。作為體制化的知識份子，他們總是依附於一個單位，這個單位決定他們的工資收入、研究經費、晉升機會，甚至還決定他們個人的或家庭的生活、醫療保健等等。一旦離開了單位，不但他們的地位會傾刻喪失，就連他們的生計也會成為問題。結果，知識份子對體制便有了一種人身依附關係。嚴格說來，在中國國家社會主義制度下，根本不可能出現墨頓(Merton, Robert)所說的『無所依傍的知識份子』。鑒於出現了這樣的一個結構性條件，再去提出一個黨國利益與知識份子利益的兩分法概念就毫無意義了。知識份子並不處在黨國之外，而是處在黨國之內。一旦當上了幹部，他們的地位同帝制時代的士大夫並沒有甚麼兩樣。在古代，一個人畢竟還有可能在未被整合進帝制官僚體系的情況下成為知識份子，然而，在中國國家社會主義體制下，要想成為一名知識份子卻不依附於一個單位，這幾乎是不可想像的。」(1997：73-76)金耀基的理論方法抓住了中國知識份子與共產黨政權關係的本質，而且有事實基礎，因此越來越受到研究者的重視，也是本書研究問題的主要思路。

第二節 理論與概念

1. 「知識份子」的定義

知識份子是現代社會的一個特殊群體。在英語中，「知識份子」

一詞分別為 *intelligentsia* 和 *intellectual*。前者來自東歐傳統，最早出現在十九世紀中葉的俄國和波蘭。*Intelligentsia*是指當時一個特別的社會階層，主要由城市精英組成。他們有較明確的認同感和群體意識。帕潑斯(Pipes, Richard)稱其是「一群受過教育、有進步思想的人」。(Gella, 1976: 12)他們不但擔當社會批評的角色，也具有一定的專業能力。*Intellectual*源於西歐傳統，最初是指一批在法國大革命後受過高等教育的人。與*intelligentsia*不同，他們來自不同的社會階層，但都有批評現存體制的共同傾向。一般認為，最早廣泛使用這個詞匯的是在1898年德雷福斯案件時期。當時，一份由許多作家、學者簽名的、反對監禁德雷福斯的抗議書曾以《知識份子宣言》的名義發表。那些反德雷福斯派也以「自命的智者」(*intellectuals*)來諷刺他們。(Gella, 1976: 48)實際上，*Intelligentsia*和*intellectual*兩者的區別並不大。西方學者先是交替使用這兩個詞匯，後來則普遍使用 *intellectual* 指稱知識份子。

二十世紀的西方學術界對「知識份子」有各種不同的定義，迄今為止仍沒有一個被普遍接受的確切界定。其中最大的區別在於究竟知識份子為數眾多，還是只有極少數精英。其中最極端的代表是葛蘭西(Gramsci, Antonio)和班達(Banda, Julien)。葛蘭西認為：每個人除了他的專職活動外，還從事某些形式的知識份子的活動，如哲學、藝術、文學等。因此，「所有的人都可以說是知識份子，但並不是所有人在社會上發揮知識份子的功能。」在社會上履行知識份子功能的那些人可以分為兩類：有機的和傳統的。前者指作為每一社會經濟政治體制有機組成部份的人士，他們為該體制在政治和意識形態上的整合和霸權發揮作用。後者指每一社會中游離於體制外的學者、傳教士、理論家等。(1971: 9)按照葛蘭西的說法，「知識份子」成了一種功能，即從事哲學、文學、藝術等精神活動的功能。這一定義不但過於寬泛，而且也與知識份子作為一個社會群體的原意相去甚遠。

班達的知識份子定義是「一小群才智出眾，道德高尚的哲學之王」(philosopher-king)，他們構成人類的良心。真正的知識份子「他們的活動本質上不是追求實用的目的，而是在藝術、科學或形而上的思索中尋求樂趣。簡言之，就是樂於尋求擁有非物質方面的利益。因此，以某種方式說，『我的國度不屬於這個世界』。」(1969：43)其實，像班達定義的這種知識份子，恐怕在任何時代和社會都是稀有罕見之人。這只能是一種知識份子的浪漫理想，很難作為衡量一個人是否屬於知識份子的普遍標準。

其他許多西方學者雖然不像班達那樣把標準定得高不可攀，但他們也對知識份子的集體人格提出一些要求，作為界定知識份子的標準。概而言之，他們認為作為知識份子應該具有這樣一些特徵：首先是**獨立性**，不能依附於宗教、政治、經濟等權力。如法國社會學家布迪厄(Bourdieu, Pierre)認為：

文化工作者要配得上知識份子的稱號必須符合兩個條件：一方面，他必須屬於一個知識份子自治的領域，獨立於宗教、政治、經濟和其他權力，他們必須尊重此領域專門法則。另一方面，他們必須在政治之外的實際的知識學科發揮自己特有的專長和權威，他們必須保持全職的文化生產者身份，而不能成為一個政治家。(1969：99)

其次是**超越性**，超越世俗的利益考慮，在象徵世界中為各種重大問題尋求解答。如美國社會學家希爾斯(Shils, Edward)認為：「每個社會中都有少數人，比那芸芸眾生更執著於探索和不斷追求那些比日常事物更具普遍意義，在時空上更為深遠的東西。他們就是知識份子。他們的天職就是探究自然宇宙的奧秘，關懷人類社會的終極價值。」(1974：3)柯塞(Coser, Lewis)認為：

知識份子在他們的活動中表現了一種對社會核心價值的強烈關心，他們是尋求提供道德標準和維持有意義的一般概念的人，他們「在